

申遗成功对探源普洱茶的重要意义

吴静波 杨宇明

普洱茶是云南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颇具品牌价值的茶叶名品。很多爱茶的茶客或多或少都能说出几座云南的知名茶山，民间也有“易武为王、景迈为后；左相班章、右将临沧；南糯在前，布朗在后”等诸多说法。古六大茶山大都位于澜沧江沿岸，归属于西双版纳、普洱等区域。人们喜爱普洱茶蕴含着岁月千锤百炼后的滋味，更喜欢普洱茶那份经光阴沉淀后的风骨，对普洱茶的探源也从未间断。



景迈山云海 本报记者 陈飞摄

普洱茶名重天下

云南省有着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和丰富的种质资源，是世界公认的茶树原产地和中国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普洱茶的种植遍布云南省全境，尤其集中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普洱茶区、西双版纳茶区、临沧茶区和保山茶区。普洱茶叶片较大，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和茶碱。

国家社会经济贸易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了清朝（1636年—1912年），普洱茶到达第一个鼎盛时期，《滇海虞衡志》称：“昔茶名重天下……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千百年来，普洱茶作为云南的“土特产”，生于西南边疆，长在红土高原，随着茶马古道运往各地。清朝学者阮福记载说：“普洱茶名遍天下，京师尤重之。”普洱茶既是西南地区各民族日常饮品，更是西藏、内蒙古、

甘肃等地游牧民族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并且登堂入室，成为王公贵族杯中的佳品。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逐渐形成了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即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陕、甘、贵、川、滇、青、藏，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

各国，成为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数百年的光阴，茶马古道上的石板被马蹄踏出一个个马蹄窝，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而沿着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向外输送的普洱茶，经过一两年甚至更多时间的艰难跋涉，在风霜雨雪、日晒雨淋、马背汗汗的加持下，晒青普洱茶鲜活的细胞在穿山越岭的路途中开始自然发酵，并在后期的存放过程中继续完成自然发酵过程，转化为难以复制、独具韵味的“普洱茶”。

茶源之争

说到普洱茶的分类学位置，不得不提一个典故。1824年，驻守印度的英军少校勃鲁士，宣称在印度阿萨姆邦（Assam）发现野生茶树。1838年，勃鲁士印发宣传册，列举他在阿萨姆发现的多株高大野生茶，并断言印度是茶树原产地。鉴于当时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勃鲁士和英国学者的诱导下，印度被先入为主地标榜成茶源地，普洱茶的拉丁学名也成了“assamica”，有关学术争议延续到了1981年，我国植物学泰斗张宏达教授多番实地考察，发现和确认所谓“阿萨姆种”是中国原种，起源于中国西南部。张宏达教授凭借充分的科学依

据，为学界正本清源，将 var. assamica 中文定名为“普洱茶种”，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世界山茶属研究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阮天禄教授在其著作《世界山茶属的研究》中对普洱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阐释：“Thea assamica Masters（阿萨姆茶）是根据英属东印度茶叶公司采自阿萨姆茶园栽培的标本命名发表的。参与阿萨姆茶树调查的 C. Bruce 指出：阿萨姆的茶树可能是当地人从远东带回来栽培的。我们翻阅了英国各大植物标本馆的标本记录，印度阿萨姆地区未见有野生普洱茶存

在的确记载。”

野生普洱茶的自然分布限于中国南部、西南部和邻近的中南半岛北部，以云南南部森林中最为常见。西南林业大学郭荫卿教授在讲授《树木分类学》时明确指出：根据植物学家对野生普洱茶分布区域的系统调查结果和国内外重要标本馆收藏的山茶属标本及其采集记录，有关普洱茶大量的标本采集和引种记录都源于澜沧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特别是以临沧至普洱段最为集中。这一区域也是当时来自英法等西方的植物学家和传教士最重视的地方。他们在采集了这

些植物标本后大都收藏在英国和法国的标本馆，普洱茶就是当年英国植物学家、传教士采集后引种到澜沧江流域气候相近的印度阿萨姆地区的植物之一，并在阿萨姆种植发展。而英国植物学家马斯特（Masters）是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的茶园中采到了普洱茶标本后命名发表。因此，普洱茶真正的原产地应为云南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也是世界山茶属茶组种类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普洱茶的起源地之一。



寄生于茶树上的“蚜虫” 本报记者 王毅摄

完整的证据链

生态环境专家杨宇明教授分析了普洱茶在云南起源并保存的地理学原因：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从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脉北麓的富金山一路南下，跨越近30个纬度，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出我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由越南胡志明市注入南海，是北半球南北跨越距离最长，连接着青藏高原与中南半岛的第一大河。由于澜沧江流域是连接着青藏高原与中南半岛的重要生物廊道，不仅物种分布集中，而且是不同生物地理区系成分的交汇过渡地带，其中山茶科山茶属等被子植物的古老类群得以在澜沧江河谷演化

发展，成为山茶属茶组的分布与分化中心。至今，澜沧江中下游仍然是山茶属植物种类分布最多最集中的河谷地区之一，目前集中分布了如大理茶、厚轴茶、德宏茶、大苞茶和普洱茶等诸多种类，普洱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古茶种。

与此同时，发现于普洱市景谷县，距今约3520万年前的茶树化石，从学术上最终确立了茶树的发源地在云南的事实，是世界茶树演化过程中重要古植物化石证据，学术价值不可估量。云南茶区，有数不清的野生古茶树、古茶树群落，这些古茶树成为中国作为世界饮用茶树原产地的“活化石”。资料显示，我国古茶树有

5600多万株，约97%分布在云南。全球茶组植物共有31个种4个变种，其中云南有23个种3个变种，以“云南茶”作模式标本定名的有16个种2个变种。作为世界饮用茶树原产地，云南分布有大量野生茶树群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王国。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的古茶树资源调查结果显示，云南有古茶树91万亩，约5400万株，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古茶树保存面积最大、古茶树和野生茶树群落保存数量最多的地方。

西南林业大学教授，云南古茶研究中心主任蓝增全介绍，云南境内发现的野生型、过渡型和栽培型古茶树代表，为证明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隐秘在临沧市双江县勐库大雪山山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集中分布着面积约1.27万亩双江县勐库镇邦马大雪山野生茶树群落，海拔2200—2750米，是目前所知野生古

茶种群分布海拔最高、种群密度最大的野生古茶树群落。而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的万亩千年古茶园，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与森林乔木混种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国内外专家学者赞誉“茶树自然博

物馆”，是茶叶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的样本，更是世界茶文化的根和源。

2010年，针对世界文化遗产领域茶主题“空白”，国家文物局启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工作，并于2021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为什么是景迈山？我们在众多解释说明文件中找到这样一些表述：“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第三纪孑遗植物的庇护所，也是山

茶树的使用价值被人类发现，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培，这一地区遂成为中国栽培型茶树起源地，并在近代传播到了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洲。该地区的云南省澜沧江下游流域，北回归线附近，受到西南季风影响，水热条件十分优越，加之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成为了全球普洱茶的故乡。公元10世纪，布明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和认识野生茶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后续到来的傣族等各族一起，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历经千年的保护与发展，形成这一林茶共生、人和谐的独特文化景观……”

随着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云南作为野生普洱茶的起源地将无可争议地载入史册。

（作者为分别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巡视员；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



大平掌古茶树 本报记者 陈飞摄

从周代金文看一些职官的得名

——以“御事”“视事”“卿士”为例

谢明文

周代金文中有不少关于职官的资料。寻绎这些资料，可以对许多职官名的得名由来作出新的解释。下面以金文资料为中心，探讨一下“御事”“视事”“卿士”几个职官名的得名由来。

“御事”

“御事”，金文与《尚书》中多见，竹书文字中见于《清华简（叁）·芮良夫谏》《清华简（捌）·摄命》等。伯仲彘“御”后之字，过去有读作“史”“事”两类意见，前一类意见又有将“御史”作为一种职官或作为“御”与“史”两种职官之别。《尚书·酒诰》“厥诰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清华简（拾）·四告》简10-11“翌日，其会邦君、诸侯、大正、小子、师氏、御事，箴告孺子通……”都是“正”与“御事”共见，可知伯仲彘铭文中与“正”并列的职官亦是“御事”。《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将金文“御事”与御史竟簋“御史”分列两处，作为不同的职官。“事”“史”系一字分化，从西周金文看，两者已基本分化完成，到了西周晚期，彼此分工已比较彻底，但西周早中期仍有少部分通用之例。中期仍有少部分通用之例，又结合后世“御史”晚出，御史竟簋“御史”实是“御事”。

叔父自“余考，不克御事”大意指“我年岁大了，不能治理事情”，此“御”与齐侯壶“用御天子之事”“用御尔事”之“御”都是动词，训为“治”，“事”是“御”的受事。这些“御事”是述宾结构（或称动宾结构）。作为职官名的“御事”当是述宾结构的“御事”转变为名词“御事者”即能治理事情、能治理王事的人，再进一步引申为专门治理王事的人，也就是职官名“御事”。

“视事”

扬鼎“己亥，扬视事于彭年叔”之“事”与燕侯旨鼎“燕侯旨初见于宗周，王赏贝贝廿册，用作有似宝尊彝”之“事”当表示同一个词。扬鼎“视事”、燕侯旨鼎“见事”之“事”与金文中多见的“休，有成事”之“事”意义相近，指“事功”之“事”。

古书中，“功”常训“事”，研究者指出金文多见的戎工戎工以及《诗经·大雅·江汉》的“肇敏戎公”之“戎公”都应读作“戎功”，“功”训作“事”，“戎功”即指“兵事”。燕侯旨鼎“见事”与史兽鼎“史兽献功于尹，咸献功”、大夫始鼎“始献功”之“献功”可合观，但“见”不必读为“献”。

诗意重阳节

郑学富

重阳得名于古籍《易经》中的“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曰“重阳”；同时又是两九相重，故又称之为“重九”。宋代词人陈著有词曰：“且喜重阳节又来，黄菊先开。”重阳节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登高望远、佩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习俗。

登高望远

最初登高是为了求吉祥，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节日习俗。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是在唐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孙思邈《千金要方》载：“重阳之日，必以酒登高望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诗人卢照邻有诗云：“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古代诗人纷纷将重阳登高望远写入诗文，以抒发浓浓的思归情怀。

佩系茱萸

重阳节佩系茱萸的习俗，相传始于汉代。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佩系茱萸可以避瘟消灾，或佩系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系，称为茱萸囊，此外还有直接插于头上的。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清阳九之厄。”

重阳节佩系茱萸一方面是为了防治疫病。我国最早的中医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茱萸“味辛温。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腰膝，根长三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的茱萸，成为怀念兄弟情谊的寄托。苏轼的诗词中也多次以茱萸喻兄弟情谊。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重阳节的前一日，苏轼与好友杨绘分袂时写下一首别情词《浣溪沙·重九旧韵》，曰：“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仔细更重看。”明、清及近代，佩系茱萸的习俗逐渐衰退。

食重阳糕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重阳糕食糕是因为重阳节有登高习俗，而在平原地区无法登高，“糕”与“高”同音，有人就由登高想到了吃糕，以吃糕代替

“见事”之“见”与姒丁尊等“见”用法相同，燕侯旨鼎“燕侯旨初见于宗周”是指燕侯旨初次朝觐周王于成周并献功（即“述职”一类，类似今天的汇报业绩一类）。燕侯旨鼎是旨觐见周王，汇报事功，属于下对上，因此说“见事”。扬鼎“扬代表王命，与彭年叔比是上下对，因此言“视事”。甲骨文“视工于洛”与侯器“视工”之“工”当读作训“事”之“功”，“视工（功）”与“视事”意思相类。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子称疾，不视事。”视事，治理政事。《左传》这类述宾结构的“视事”可能是由扬鼎铭文中这类述宾结构的“视事”进一步演变而来，即后者“视事”中的“事”由事功义演变为一般的事情义。战国金文中用作职官名的“视事”，很可能就是源于《左传》“不视事”这类述宾结构的“视事”，这与职官“御事”的得名是平行的现象。

“卿士”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职官名“卿士”，西周晚期、东周金文中常作“卿事”，竹书文字中有“卿事”“卿李”“向使”等写法，不少研究者用“士大夫”之“士”来理解“卿士”之“士”，这实际上是受传世文献的影响。从西周金文资料看，“士”“事”的用字习惯截然不同，两者没有交涉（研究者或将金文中一般释作“将事”的词读作“将士”，是有问题的），古书中“卿士”之“士”是一个假借字，作“事”是较早的用字。如果“卿事”之“事”与“御事”之“事”相同，也表示“事情”之“事”的话，根据职官名“御事”源于述宾结构的“御事”，可以合理推测职官名“卿事”也应该源于述宾结构的“御事”。“卿事”之“卿”确可能源于训“面”“迎”一类意思的“卿（饔）”。“卿”既可训“迎”，又可训“治”，“卿（饔）”可能与之类似。“卿（饔）”本为述宾结构，转变为名词“卿（饔）事者”即“迎事之人”或“治事之人”，再转变为职官名。

但据出土资料，“卿事”之“事”所表之词可能是“使”。如是，则“卿”既可读作“饔”，也可能读作“饔”，如是前者，则“卿事”最初可能是迎接使者，然后转变为专门负责迎接使者的人，再进一步引申为职官名。如是后者，“卿事”最初可能是宴饗使者，然后转变为专门负责宴饗使者的人，再进一步引申为职官名，这种可能性较高。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